

张注洪 主编

历 史 轨 迹

文化关系的

ZHONGMEI
WENHUA GUANXIDE
LISHI GUIJI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 美 大

本书为国家教委“八五”期间人文科学基金资助研究课题

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

张注洪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张注洪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12
ISBN 7-310-01531-2

I. 中... II. 张...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美国 IV.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05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电话:(022)23508542

出版人 肖占鹏

承印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2

字 数 321 千字

印 数 1—1000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绪 言 中美文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
一、研究的进程与趋势	(2)
二、研究的重点与问题	(7)
三、研究的思考与建议	(12)
第一章 近代中美文化关系	(1)
概 述	(1)
第一节 美国传教士与中美文化交往	(3)
一、创办教会学校,以教育传教	(3)
二、编译和出版书刊杂志,以文字播道	(10)
三、举办“服务”事业,为传教铺路	(15)
四、美国传教士与中国政治、文化运动	(19)
第二节 “庚款留美”与中国现代化	(25)
一、“庚款留美”的缘起与特点	(25)
二、“庚款留美”与中国政治民主化	(31)
三、“庚款留美”与中国教育科技的发展	(39)
四、“庚款留美”的作用与影响	(46)
第二章 现代中美文化关系	(53)
概 述	(53)
第一节 民国时期留美归国学生在工农业生产中的 作用	(55)

一、留美归国的工农科人才状况	(57)
二、留美归国学生从事工业生产	(63)
三、留美归国学生从事农业生产	(81)
四、留美归国学生与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	(91)
第二节 《密勒氏评论报》与中国抗战.....	(100)
一、早期的《密勒氏评论报》	(101)
二、开始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活动	(104)
三、积极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109)
四、《密勒氏评论报》帮助中国抗战的历史评价	(129)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考察、研究与成果	
评析.....	(139)
一、实地考察与新闻评述	(140)
二、专题研究与史料编纂	(145)
三、具体论述与不同观点	(151)
四、研究特点与历史启示	(158)
第四节 《西行漫记》的传播和影响.....	(159)
一、打开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真实情况的窗口	(160)
二、开拓了采访红色中国和报道中国革命的途径	(166)
三、为中美人民的友好交往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171)
四、传播和影响的原因与评析	(176)
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美文化交流.....	(177)
一、美国对华文化政策与文化“援助”	(177)
二、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文化交流	(189)
三、美国驻华新闻记者的抗日报道与解放区同 美国的文化交流	(198)
四、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文化交流的影响和启示	(205)
第三章 当代中美文化关系.....	(212)
概 述.....	(212)
第一节 当代中美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	(214)

一、曲折发展的岁月	(214)
二、局部进展的年代	(224)
三、全面开展的历程	(226)
四、历史回顾与思考	(234)
第二节 当代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与评析.....	(238)
一、当代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概述	(238)
二、当代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进展与深入	(243)
三、研究的评析与思考	(253)
第四章 历史人物与中美文化关系.....	(256)
概 述	(256)
第一节 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及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259)
一、创办燕京大学前在华的传教活动	(259)
二、创办燕京大学的缘起与经过	(264)
三、创办燕京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274)
四、从司徒雷登看外国传教士在华兴办教育	(276)
第二节 胡适与中美文化关系.....	(281)
一、对美国文化的吸收与宣传	(282)
二、通过中基会促进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287)
三、向美国传播中国文化	(294)
四、胡适与中美文化交流	(309)
第三节 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313)
一、史沫特莱对中国抗战的考察和支援	(314)
二、斯特朗对中国抗战的采访和报道	(321)
三、斯诺对中国抗战的帮助和宣传	(325)
四、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新闻活动的深远影响	(331)
第四节 费正清中美关系史研究与评析.....	(332)
一、费正清的学术生涯与中美关系	(332)
二、费正清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特征	(338)

三、费正清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历史影响	(350)
后 记.....	(356)

第一章

近代中美文化关系

概 述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在清末王朝和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下，中美文化关系基本表现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美国文化向处于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带有强制性的单向输入。所经渠道主要通过美国教会在中国传教、设医院、办学校、吸引和接受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深造。

这时期中美文化关系的发展，经过了复杂曲折的历程。美国取得独立（1783年）之初，中美两国人民曾经通过和平通商有过最初的往来。1784年美国商船首航广州就有美国商人、冒险家和海员来中国，由于美国文化远落后于欧洲，早期来华的美国人大多只是赞美中国的古代文明，带了些艺术品回去。稍后的1795年，中国也有些木工和海员漂洋赴美。但这些人的社会构成和文化程度都不足以成为中美

文化联系的使者。1830 年美国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到广州传教。鸦片战争之后，1844、1868 年，美国先后通过与中国签订《望厦条约》、《蒲安臣条约》，迫使清政府接受了有关美国人在华传教和传教受到保护的条款。19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美国在华传教活动初奠基础；从 60 至 80 年代，由于美国内战的影响，美国在华传教活动一度陷于停滞，此后至 20 世纪初则进入迅速发展阶段。传教士传教的目的在于通过十字架和《圣经》征服中国，以实现教会和美国的利益^①。但教会为扩大传教的影响，采取了办学、办医院、办报刊等手段，传教士也就成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教会学校的课程是宗教的经典、教义，西方传统的科学知识也是教会学校的必修课程之一；教会医院自命从事教会“慈善”事业，也把西医、西药和医院制度介绍进来；教会报刊宣传宗教教义，同时也讲些科学知识。这些都在客观上起到了中美文化交往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传教士资助下，容闳等 3 人赴美留学，继而有 1872 至 1875 年的 120 名幼童分四批赴美留学，后由于美排华激起国人愤慨等原因，导致 1881 年分三批提前召回。大规模的吸引和接受留美学生，则是 20 世纪初的“庚款留美”，其实质正如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所指出的，“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使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②。仅 1909 至 1917 年，用庚款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即达 853 人。但这些留学生在美国接触到一个广阔的世界，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有真切的认识，这使他们有可能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者。

近代时期中美之间这种单向的、扭曲的、所谓“挑战——应战”的文化接触的形式，常常表现为“来而不往”或“有来无往”，实际谈不上“交流”。这种文化关系，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古典文化交流显然是不

^① Arthur 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New York: F. H. Review Co., 1907), p. 236.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06 页。

同的。中国在西方炮舰包括美国炮舰的威胁下,被迫接受了它们的商品,也被迫接受了西方和美国的文化。近代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门户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方和美国的冲击下“逐渐解体、蜕变和转向现代化的复杂而痛苦的过程”^①。

本章包括《美国传教士与中美文化交往》、《庚款留美与中国现代化》两节内容,可以反映这种复杂而艰辛的历程。

第一节 美国传教士与中美文化交往

从 1830 年 2 月第一个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来华,到 1949 年 8 月司徒雷登离开南京,100 多年中,大批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到中国。他们在华创办学校,编译出版书刊,创办医疗卫生事业。传教士的文化活动,自然属于文化侵略的性质,但也在客观上传播了近代美国文明,促进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在中美文化交往中起了某种桥梁作用。

一、创办教会学校,以教育传教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784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才开始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接触。但到 19 世纪初,美国对华贸易已居第二位,仅次于英国。为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美国基督教差会决定向中国“传播福音”。1830 年,美国的一个基督教差会美部会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裨治文来华前,差会发

^① 罗荣渠:《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31 页。

给他一封长篇指示信，要求他积极、机智和忠诚地对中国人进行传教。信中说：“终有一天，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它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此后，美国的浸礼会、圣公会、美以美会等都先后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从1830年到1848年，各国新教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共计98人，美国有73人。但总的看，由于英国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较早，19世纪，英国势力占主导地位，其传教士约占全体在华传教士的50%。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势力迅速增强，到1914年，美国在华传教士超过英国，美国在华传教士占在华传教士总数的60%。

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要传播基督教义，企图实现中国的基督教化，把中国纳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体系，进而和平征服中国。正如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明恩溥所说：“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界上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收回利益。”^①

由于清政府禁止传教，早期来华传教士讲经布道、传播福音、发展教徒的工作进展缓慢。裨治文在广州活动了17年之后，这里才有了基督教徒。美以美会传教士入华10年，才发展了一名教徒。公理会1847年进入福州，1856年才有了第一位信教者。1846年入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70年代前一直忙于巡回布道，每到一地都对当地群众宣讲圣经，发放各种宗教小册子。他在给国内差部总会的一封信中报告了传教活动的困难：“我们每人雇一头驴驮着我们的行李和书籍，而我们自己则步行走街串镇，在街头宣讲福音。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先后在190个村庄里布道……我们得花相当长的时间招揽听众。有一次我费了好大劲也没有找到一个人听讲。很多人看见了我们，但只匆匆走过，并不停下来。一个男孩大着胆子询问我们从哪

^① 明恩溥：《今日中国与美国》（Arthur Henderson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New York: F. H. Review Company, 1907），第236页。

里来,但立刻受到旁边干活的一个男子的训斥。我和助手坐下来等了半个小时,最后只好转向其他村子。”^①

传播福音步履艰难使传教士们很快就发现,由于他们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差距实在太大,传播福音不能引起中国人的共鸣,而办学则是传教最强有力的手段。正如1854年入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斯所说:教会学校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式”^②。

美国传教士率先在华办起了教会学校。第一所学校是1830年2月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贝满学校,只收了四五名学生,且举办不久即关闭,但它开创了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办学的历史。1836年,寓居广州的外侨组织为纪念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创办了马礼逊教育会,由美商奥立芬赞助,裨治文任秘书。裨治文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认为“教育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海陆军力量、最繁荣的商业刺激以及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③。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后,即向美国发出呼吁,要求派遣教师前来中国开办学校。美国耶鲁大学马上作出反应,派该校毕业生布朗来华。1839年,马礼逊学堂正式开学,首批学生6人,1842年迁到香港,学生逐渐发展到三四十人。

19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洋务运动逐渐兴起,迫切需要西学知识和人才;1868年,美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传教受到保护,打开了美国传教士自由无阻地进入中国传教与办学的道路;60年代末,美国又掀起了“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传教士被派往国外去传教。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大增加。1868至1898年,美国派往海外的传教士共

^① 菲舌尔:《狄考文在中国山东传教45年》(Daniel Fisher, *Calvin Wiln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ong, China*) (philadelphia, Penn.: Wiseminder Press, 1911), 第105页。

^② 倪维思:《中国和中国人》(John L Nevias, *China and Chinese*, New York), 1869年,第342页。

^③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6年12月。

达 8000 多人,其中有 2500 人被派到中国,致使美国在华无论是传教、办学校,还是办慈善事业方面都居西方国家之首。据统计,到 1898 年,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已拥有 155 个教会,849 个分会,40027 名中国教徒。开办 1032 所初等学校,有学生 16310 人;有 74 所中等以上学校,拥有学生 3819 人^①。比较著名的有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设的蒙养学堂(1876 年改为文会馆);1865 年圣公会在上海开设培雅学堂,第二年又开设度恩学堂,1871 年合并成立上海圣约翰书院,1894 年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875 年圣公会在武昌开设文惠廉纪念学堂;1881 年监理会在上海开设中西书院;1882 年长老会在山东开设广文学堂;1889 年长老会在广州开设格致书院;1888 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开设汇文书院,1889 年公理会在通州开设华北协和书院。此外,还开办有北京贝满女塾(1864 年)、上海圣玛利女学(1881 年)、广州真光女学(1881 年)以及上海中西女学等等。

20 世纪初,教会大学特别是美国在中国所办的教会大学得到迅速发展。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第一,清政府 1901 年颁布《学堂章程》,改书院为大学,增设西学科目。教会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占主导地位,也纷纷建立大学,以同中国公私立大学竞争。第二,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使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根治中国老百姓的“排外情绪”,就必须争取中国的文人学者、知识阶层,就必须发展高等教育,输送更多的人到社会各个关键部门。第三,美国一向重视通过办学这种方式以“占领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正好乘机大力发展教会教育。

比较重要的大学有:苏州东吴大学(1901 年)、武昌文华大学(1903 年)、广州岭南大学(1904 年)、圣约翰大学(1905 年)、华北协和大学(1905 年)、由广文学堂发展成的齐鲁大学、由汇文书院和华北协和书院合并成的燕京大学,等等。当时,中国所办大学十之八九是教会创办的。据统计,1889 年,基督教在华所办大学的学生人数为 16836 人,到 1920 年增加到 245049 人,增长了 13.56 倍。

^①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4 页。

1922年以后,由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和发展,特别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教会学校势力受到打击。三四十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扶持,美国教会学校又得到迅速发展。

美国传教士除直接在中国开办学校外,还将教会教育渗透到清政府官办教育机构。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同文馆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新式学堂,也是最高学府。同文馆名义上虽然是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实际上却被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操纵。1865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到同文馆英文班任教习,1869年11月,又出任同文馆总教习,一直到1894年,1898年又当上了京师大学堂总练习,一直到1900年。丁韪良前后任职这所高等学府达32年之久。

教会教育是移植到中国文化肌体上的异物。这种文化移植在外国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中美文化交流是单向的,即美国向中国输出基督教文化。但是,文化侵略不同于枪炮战争,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总是相互渗透,错综复杂。就教会教育本身来说,它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新的科学文化知识。

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有利于西学的介绍。中国旧式教育偏重于科举,讲求进身之道,学生所学科目皆封建纲常,对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没有直接作用。而传教士所开办的教会学校,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传播近代西方科学。如布朗夫妇任教的马礼逊学堂,教学内容包括基督教教义、各种近代西学知识和古代汉语。除古代汉语由一位中国先生任教外,其他各门课程皆由布朗夫妇任教。布朗夫妇不仅给学生灌输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等西方知识,而且还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容闳等留学美国的促成者。1846年布朗夫妇回国时,容闳、黄宽、黄胜三人随同赴美。容闳后来考上耶鲁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黄宽赴英国就读于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留英学生和中国第一位西医的传播者。又如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81年在上海开设中西书院,八年

的西学课程循序渐进,高年级的课程有:化学、重分、微分、积分,还有航海测量、天文测量等等。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所办的登州文登会馆,九年学制中,设有数学、地理、代数、测绘学、化学、动植物学、天文学等课程。他还在1896年“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作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把课程列为六种:语文、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并认为开设西学课程可以使教会有声望。特别是教会大学,有些与美国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耐尔大学等有联系,直接把美国大学的院系设置、课程安排移植到中国来,有利于西学的传播。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创设的农学院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及对水稻、小麦等品种的研究,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对西医学的传播,燕京大学对新闻学的研究,圣约翰书院的工商管理,等等,都在西学传播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教会教育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的上海同文馆、1864年的广州同文馆的创设。以后,清政府又陆续开设了一些工科学校和军事学校。这些官办新式学校的开办与传教士的影响不无关系。有许多传教士就担任了这些学校的教习或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任职期间,进行教育改革,逐渐引进了算学、化学、国际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新课程。这些教育内容后来逐渐为中国教育所接受。

有些传教士还利用和清政府官员的接触或舆论工具,促进中国教育改革。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拜会恭亲王奕訢时,曾面呈《创设学校议》,论述学校的重要,并介绍了新学的种类及设立新学的方法,还提出改革学制和考试制度。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利用他主办的《万国公报》发表多篇文章,批评中国旧的教育制度,认为“中国人才之不振,由于教化之不兴”,主张中国应改革科举并兴新学,在现有书院设天文、舆地、格致、船政、法学等学科。狄考文在《振兴学校论》一文中,批评中国学校教授的内容太窄,不适应社会发展,主张广设普通学校

和职业学校,开办大学和女学,把中国的士、农、工、商纳入学。狄考文还主张废除科举制度,代之以西方学校授予学位的方法。20世纪初,清政府明令废八股、停科举、开新学,虽然是客观形势所迫,与传教士的活动、宣传和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教会学校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传教士们在办学过程中,同时也认识到,如果教会学校仅仅传教,同样引起不起中国学生的兴趣。美国传教士狄考文1864年在山东登州开设蒙养学堂,到1872年,共招收九届学生,85人,而学满六年的只有4人;先后皈依基督教的有14人,到1872年已有5人背道。这样的教训使狄考文认识到:举办教会学校,必须给中国人智力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教育,“这些学校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明,必不可少地要在物质上和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善果”^①;基督教教育决不能排斥科学,科学要成为宗教的盟友。狄考文的观点后来逐渐地被传教士们所接受,成为在华传教士传播西方文明的一个指导性原则。这样,在传教士的教会学校里,一批初步接受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美国传教士卜舫济经营的圣约翰大学培养了大批商业管理人才。据1926年统计,该校有158名毕业生在商界任职,占毕业生总数的58%。司徒雷登经营的燕京大学从1917年到1936年,培养了400多名教育界人才。美国传教士布朗是中国近代留学活动的最早促成者。在他的帮助下,容闳赴美学习,学成回国后,积极设计并推动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从1872年第一批幼童赴美,到20世纪初中国形成“留学潮”,成批成批的留学生接受了近代文明。他们无论是在科技、文化或政治方面,都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① 狄考文:《基督教差会与教育的关系》(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大会上的报告),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二、编译和出版书刊杂志，以文字播道

编译和出版是传教士在华的重要文化活动。他们认为“文字播道”比创办学校影响更为广泛，收效更为显著；同时，传教士要把在中国了解到的情况、信息和动态提供给本国，作为侵华的参考。这些是他们从事编译和出版活动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报刊和书籍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编辑报刊方面。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最早的刊物是英文期刊《中国丛报》。它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倡议，由美国公理会提供的印刷机和活字机，美商奥立芬提供开办费用并拨给一所楼房作为编辑印刷之用的基础上创办的。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负责编辑，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被指定为该报的印刷人和发行人（后来也参加编辑）。

《中国丛报》从1832年5月创刊，到1851年12月停刊，前后连续出版20年，发行刊物20卷（每月一期，每年一卷）。裨治文在创刊号上指出了该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出版《中国丛报》，广泛了解中国的各种情况，包括气象、土地、江河海的生产等自然资源；了解中国商业的过去和现在，考察商业状况的利弊；了解中国的社会关系，如统治者与百姓、丈夫与妻子等等。因而，《中国丛报》辟有名目繁多的栏目，有宗教消息、书评、文艺杂谈、时事日志、近代中国介绍、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等等。

从内容上看，《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间处在激烈动荡和急剧变化之中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历史、地理、文化、气象等等。尤其是它特别重视报道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记载了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译载了许多如清帝上谕、大臣奏折等重要文件，为研究鸦片战争前后20年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开端和早期中外关系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此外，《中国丛报》还翻译和介绍了中国历史、宗教、农业、儒家经典和文学艺术作品等，对